

多视野全景式呈现千年古道演进图景

——《崤函古道史》序

王子今

李久昌教授的著作《崤函古道史》面世，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喜事。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裴骈《集解》引《新序》论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党，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238页。]这是比较早地使用“崤函”这一地理标志符号的文献。《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徙天子都长安。”裴松之注引《续汉书》说，司徒杨彪等反对，“(董卓)作色曰：‘杨公欲沮国家计耶？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又陇右取材，功夫不难。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官室官府，盖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176页至第177页。]所谓“崤函之固”“崤函险固”，是提示了“崤函”的交通地理地位的。[“崤函之固”，亦见于《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版，第294页；《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第2205页。前者标点为“崤、函之固”。]后来史籍所谓“崤函险阻”[《晋书》卷六一《周赧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1664页。]、“崤函”、“险塞”[《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贵州险塞，孰若崤函？”第2874页。]、“崤函阻凭”[《陈书》卷一《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3月版，第16页。]、“崤函隔绝”[《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8页。]、“崤函之险”[《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唐重》，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13186页。]等等，也都强调了大致同样的意思。

秦武王三年(前308)，曾经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

矣。”[《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9页。]《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写作：“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车通”字样，表达了抵达“三川”“周室”的交通愿望。甘茂则陈说了秦东进的困难：“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都也。今王倍秦数倍，行千里攻之，难。”关于所谓“倍秦数倍”，张守节《正义》：“谓函谷及三崤、五谷。”[《史记》，第2311页，第2312页。]所谓“函谷及三崤、五谷”，大略说明了“崤函”交通的“险”。在班固笔下，又称作“函谷，二崤之阻”。[《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335页。]

李久昌教授著作《崤函古道史》全面考察了这条古代重要交通干线的开通、利用、养护和经营的历史，叙述了相关文化作用和社会影响，在多方面提出了新见。对于线路走向的变迁，进行了细致的探析和说明。就一条古代道路的历史演进进行全景式的描绘和比较具体的考论，《崤函古道史》是并不多见的成功的学术论著。

这条古代道路联系着长安和洛阳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在汉唐时代，“崤函古道”其实可以看作大一统王朝的生命线。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就都曾经有所论说。[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1986年5月，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从生态环境视角进行“崤函古道”的考察，拙文《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亦曾尝试。[王子今：《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6期，收入李久昌主编《崤函古道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

年8月版。]而李久昌《崤函古道史》则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周到的考察，更为细致的论述。在第一章“崤函古道发展的基础要素”的第一节，特别就“自然地理与环境特征”有所说明，分析了“地貌特征”、“河流与水文”、“气候特征与植被状况”以及“自然环境对崤函古道交通的影响”多个方面。这样的研究视角，是以往一些交通史学术论著容易忽略的。

我们说“崤函古道”交通路线堪称汉唐王朝的生命线的说法，可以通过《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下》“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隋书》卷二五《食货志》“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等记载。[《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第39页，第54页，第685页。]，得以深化认识，增益理解。《史记》卷三〇《平淮书》记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下，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时，“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余乃足。”“漕运最繁盛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史记》，第1418页，第1436页，第1441页。]“崤函古道”与“河漕”属于同一交通系统。李久昌教授著作《崤函古道史》专门讨论了“三门峡黄河漕运”。我们曾经注意过秦“底柱丞印”封泥所提示可能秦时已经开发“底柱”“河漕”的信息。[王子今：《说秦“底柱丞印”封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3期。]而李久昌著作《崤函古道史》在“秦汉三门峡黄河漕运的兴起”一节的第一部分论及“先秦三门峡黄河漕运的发轫”，将“河漕”史的“发轫”提前到先秦。这当然是关心漕运史与黄河史的朋友们应当认真阅读的。

《崤函古道史》全书坚持实证原则，重视文献资料、考古收获与实地考察的结合，表现出很好的学风。“崤函唐诗之路”一节的论述，亦别开生面。其中“唐代

崤函本土诗人与文学世家”部分所给予读者的文学地理知识，是富有特别的文化意义的。

“崤函古道”于经济史、军事史、行政史、文化史的地位，作者均一一涉及，予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隋唐崤函古道与丝绸之路”一节的设计，也将这段古道历史文化意义的研究予以有积极学术价值的扩展和延伸。所论“隋唐丝绸之路与崤函古道”、“崤函古道沿线的蚕桑丝织业及其西输”、“考古遗迹所见崤函古道沿线的中外文化交流”等主题，均各有深意。所发表的意见，是可以充实有关隋唐丝绸之路史的认识的。

苏轼的诗有“惊风击面黄沙走，西出崤函脱尘垢”，“十里长亭闻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宋]苏轼：《送孔郎中赴陕郊》，《施注苏诗》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6页。]麻革写道：“万古津茅拥上游，崤函西去接秦头。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金]麻革：《过陕》，(元)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景元钞本，第4页。]宋祁作品则可见如下诗句：“月枢残白伴征轮，雪岭萧萧久垫巾。此去崤函天设险，古来京洛地多尘。翠含山气犹疑夜，谁动林梢已放春。自笑衰翁应分定，宠光行役两平均。”[宋]宋祁：《澠池道中》，《景文集》卷一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98页。]古来途经“崤函古道”行走“京洛”，有很多的艰险和辛苦，会体验到“悲风”“落日”的冷漠。但是也会有目中“秀色”、心底“宠光”，“紫动林梢已放春”的欢快感觉。李久昌教授的“崤函古道史”研究，或许也有多年辛劳之后，终于完成厚重成果，将“春”“林”“花柳”捧送学界的欣喜。

谨此致贺《崤函古道史》面世。也预祝李久昌教授继续努力，获得更多优秀的学术成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博导)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

作者：杨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于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从宏观层面的县域教育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县域教育体系的构成与运行，到微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等。作者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回应了县域教育为谁发展、如何发展。

《曾有西风半点香》

作者：扬之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名物学家扬之水对敦煌艺术名物的集中考证。书中所用的材料和图片等系作者赴敦煌等实地考察中的亲历所见，并都进行一一严谨考订，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作者在排列这些材料的年代和地域时，结合文献资料得出缜密而有说服力的结论，对艺术史和艺术研究等具有显著意义。

《笑的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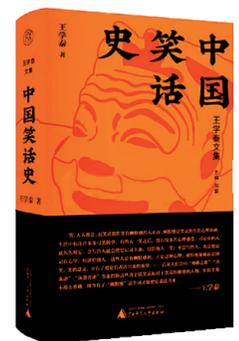
作者：[法] 阿兰·维扬
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人类学视角解读了“笑”这种生理现象。在本书中，作者梳理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笑的表现，探究了它的美学价值和艺术应用(在漫画、滑稽艺术等艺术领域)，得出了一些关于笑的基本原理与机制。作者还尝试总结了笑的历史的、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内涵和社会作用。

(综合)

《中国笑话史》：中国式幽默的前世今生

邓勤



嘲谑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氛围下，笑话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了质的飞跃。《笑林》的诞生，标志着第一部笑话集的出现，它以民间笑话为主要素材，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幽默智慧与生活百态。而《世说新语》则是文士笑话的确立之作，它聚焦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与言谈，以其玄远冷峻、高简瑰奇的风格，展现出文士阶层独特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风貌。书中的笑话或赞颂人物的高雅品德与卓越智慧，或在幽默中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或巧妙地揭示人性的丑陋，与《笑林》相比，更注重语言的机智与隽永，读来余味无穷。

王学泰认为，富于幽默感的人士大体可细分为幽默人、怪人和优人三类。以怪人为例，他们品类不一，或基于愤怒，或出于悲哀，万不能解，于是借助一笑，化其胸中的块垒，比如明代的徐渭。有的或食古不化，不知变通，做出许多怪事引人发笑，比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西汉末年的王莽。有的就是愚昧，不仅昧于大道，就连普通的人情世故也弄不明白，所以做人行事，处处留下笑柄，历代笑话作品中就这类典型人物，如迂公。

《中国笑话史》是首部对中国笑话发生、发展史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心理。笑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思想情感的表达。透过这些笑话，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关系以及审美情趣的变迁。它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国传统笑话深处的大门，让我们在幽默诙谐中领略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智慧与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以笑话的“自觉时期”为例，大致涵盖魏晋至隋唐五代。社会的动荡与文化的多元交融，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自由，对幽默的追求也更为强烈。写人物与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人与人之间相互

温情的力量

——读梁晓声的《独自走过悲喜》

陈伟雄

书评



如果说《人世间》彰显了梁晓声的倔强，那么《独自走过悲喜》这部书，则是梁晓声给现实的温柔。他的文字，如同冬日暖阳，穿过冰冷的云层，照亮我的内心。

《独自走过悲喜》是著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创作的一部散文集。本书分为五辑，三十五篇文章，分享了他七十余年的经历与感悟。既有对苦难的书写，亲情的描述，也有对小人命运的关照。严肃与幽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字里行间透露出他豁达、睿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梁晓声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主义风格。他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用文字的力量为弱势群体发声，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的作品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广泛影响力。例如，文章《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讲述了小职员张宏在北京打拼的故事。他为了保住工作，无止境地加班，兢兢业业，最后

还是病倒，无奈返乡，表达了作者对现代青年生活状况的同情和担忧，以及希望自己能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看自行车的女人》则刻画了一位遭受冤枉，却仍不失热心助人的看自行车女人，从而呼吁人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应该给予平等和尊重。

梁晓声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无论世间多么苦难，多少至暗时刻，人性的光芒都会穿透层层阻碍，照亮人生路。如《玻璃匠和他的儿子》一文中，围绕着玻璃刀上一粒金钢石的遗失，讲述了父子两人感情变化的过程。金钢石虽不能复得，但玻璃匠却能自我反省，改掉了暴躁的脾气，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宽容大度，使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从紧张变得融洽。平凡的小事，彰显着人性的光辉，更见证父爱的伟大。《瘦老头》一文，讲述了一位身患绝症的独居老头，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教育孩子的故事。瘦老头用爱、理想、耐心

和他最后的生命构建了一个阳光课堂，意外地改写了一群失学儿童的人生。瘦老头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感人至深。

梁晓声的散文具有很强的情感感染力，容易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他对亲情的描写细腻真挚，充满温暖。如《兄长》一文，催人泪下。作者回忆哥哥对自己百般照顾和袒护，让他心存感激，但哥哥常年孤独的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不能接到自己身边照顾，又让他感到深深的愧疚，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令人十分感动。再如《一支钢笔》讲述了作者想要一支吸水钢笔，可是家里境况不允许，他和母亲产生了冲突，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在风雨中，他想到了去桥下帮拉货的车夫推车，赚取小钱，然而当他伸手要钱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车夫是自己的母亲。小小的钢笔不仅凝聚着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也给了儿子生活的勇气。

《黄金时代》：荒诞与真实间的灵魂独白

杨称权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杰作。这部作品不仅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更以其对人性、自由、爱情以及时代背景的深刻探讨，让广大读者在笑声与泪水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与共鸣。

《黄金时代》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年代。然而，王小波并没有直接描绘那些广为人知的宏大历史事件，而是巧妙地选取了几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片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既荒诞又真实的时代。这种处理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与刻板，使作品更加鲜活，贴近人心。

小说中，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将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描绘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王二与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还是他们在“破鞋”风波中的种种遭遇，都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悲哀。这种荒诞感，并非单纯为了逗乐读者，而是对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讽刺与批判。

然而，在荒诞的背后，王小波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灵魂。王二、陈清扬、小孙等人，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内心深处却始终保留着对自由、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对真实情感的执着与坚守，成为他们在荒诞时代中唯一的精神支柱。

《黄金时代》的另一大主题，是对自由与束缚的深刻探讨。在那个时代，个人的自由被严重压抑，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与监视。然而，正是在这种极

端的束缚之下，王小波笔下的人物们却展现出了对自由无比的渴望与追求。

王二与陈清扬的“伟大友谊”，实际上是一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探索。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爱情与友情，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在彼此的陪伴下，他们找到了在荒诞时代中难得的宁静与自由。这种自由，虽然只是暂时的、有限的，但却足以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小说也揭示了自由与束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自由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又可能导致混乱与无序。因此，如何在自由与束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成为了王小波在小说中反复思考的问题。除了对自由与束缚的探讨外，《黄金时代》还深入探讨了爱

情与欲望这一主题。在小说中，王二与陈清扬之间的感情纠葛，成为了贯穿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

然而，这种爱情也并非完美无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爱情面临着种种挑战与考验。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与误解，还是来自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都让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正是这些挑战与考验，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坚定与深厚。

《黄金时代》是一部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作品。它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荒诞又真实的时代画卷。让我们在笑声与泪水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让我们在反思与共鸣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时代价值。